

「重慶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海峽兩岸學術與文化論壇紀實

蘇聖雄 國史館科員

一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抗日戰爭勝利。此一戰事為20世紀極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塑造世界基本格局，並持續影響至今。近年來因史料發掘、思想解禁與流通，已有較好的抗日戰爭學術研究環境。重慶為戰時國民政府所在地，在政治、軍事及經濟上皆極為重要，是推進抗戰研究極佳的切入點。本（2014）年初，中國大陸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有鑑於本年為中國首次立法後之抗戰勝利紀念日，8月31日至9月4日，在重慶舉辦「重慶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海峽兩岸學術與文化論壇，由重慶大學、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主辦，重慶國際交流促進會、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重慶史研究工作坊、重慶大學港澳臺事務辦公室承辦，在實地感受歷史滄桑的同時，對抗戰歷史文化研究共襄盛舉，以期奠定今後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之基礎。與會人士共50人，含括兩岸重要學術機構之知名學者，計三場主題演講，發表18篇專題論文。

二

9月1日上午，論壇開幕，由南京大學榮譽資深教授張憲文、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發

表主旨演講。張憲文演講「抗日戰爭史研究述評」，爬梳中國大陸抗戰史研究歷程，區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85 年以前，抗戰研究很少，沒有抗戰專家，是非理性研究的階段。第二階段為 1985 年至 2005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在 1985 年主張應將國民黨的作用，放入抗日戰爭論述之中，並提倡在盧溝橋建立抗戰紀念館，至此開啟第二階段的研究；其指導思想，為各黨派在中共領導旗幟下共同抗戰。1995 年 9 月，兩岸學者在臺北參與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研討會，象徵兩岸對抗戰形成共識。至 2001 年，南京大學出版《中國抗日戰爭史》，全面反映國民黨正面及中共敵後兩個戰場的抗戰。2005 年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公開肯定國民黨正面戰場，開啟第三階段的研究至今，此期思想全面開放，研究走向繁榮，並隨著中共經濟發展，舉辦許多盛大活動。

首次赴大陸參加民國史研討會的陳永發，演講「論抗戰中的國共關係」，根據日本的基本戰略和蔣中正的因應措施，將抗戰八年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敘述各階段的國共關係。第一階段為 1937 年至 1938 年，蔣中正無暇顧慮中共，有意在對外民族戰爭中將中共融化於無形。第二階段從 1939 年到 1941 年初，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敵後的實力出現明顯消長，共產黨逐漸取代國民黨成為日軍主要對手。第三階段從 1941 年至 1943 年，中共受到日軍掃蕩及國民黨封鎖，產生

危機，於是透過整風審幹運動，加強內部共識，同時以重新分配的經濟政策，動員和鞏固農民，最重要的是以精兵減政和種植鴉片，減少對農村人力和物力的汲取。第四階段則從 1944 年到 1945 年，日軍又將作戰重點置於正面戰場，國民政府遭受嚴重打擊，中共藉此大肆擴張。由於中共軍隊有農村基層組織的強力支持，不僅可以應付日軍的掃蕩和國軍的競爭，更可以大肆擴展其組織，因而改變國共軍事力量對比。

楊天石演講「珍珠港事變前夜的中美衝突」，娓娓道來 1941 年 11 月中美之間的短暫衝突。此衝突的起源，為美國企圖拖延遭受日本進攻的時間，避免過早陷入「兩洋作戰」的不利局面，企圖在一定時間內，放鬆對日本的經濟封鎖。蔣中正則堅決反對美國改變立場，激烈抗爭。最後羅斯福總統承認考慮不周，接受蔣的意見，對日政策由有限度的妥協，恢復為全面強硬，美日談判因而破裂。日方見美國已成為蔣中正的代言人，遂決定開戰，突襲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戰爭因而爆發，中國抗戰也藉此獲得最大、最堅強的勝利保證。

三

下午，承接主旨演講，召開第一場學術研討「抗戰中國的國家戰略（一）」，由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主持，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張瑞德



會議場景（攝影／蘇聖雄）

評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報告〈抗戰中國的國家戰略與蔣介石〉，將中國國家戰略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1931 年至 1937 年，為守住底線；第二階段 1937 年至 1941 年，為苦撐待變；第三階段 1941 年至 1945 年，為大國戰略。中國各階段戰略，各有利弊，總體來說，蔣中正在抗戰時期的戰略思維和國家戰略，基本成功，尤其在爭取國際同盟方面，表現出領袖能力和領導能力，惟對內政治顯有不足，妨礙領導能力之最大化。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潘錫堂，專長當代兩岸關係，此次報告〈對日抗戰時

期中國軍事戰略之研究〉，對抗戰背景充分說明，概括抗戰中國的國家目標、國家戰略構想、軍事戰略、軍事戰略指導等。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陳廷湘報告〈重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義〉，打破學界舊說，認為淞滬會戰沒有達到阻止日軍過早控制武漢的戰略意義；未能使國軍獲得更大的戰略空間和戰略地形，以減輕損失，持久抗戰；更未能為東部工業和人才西遷爭取更多時間；也未發揮維護中蘇交通線之作用。因中國是弱國，此戰過早將中國抗戰由局部戰爭轉化為全面戰爭，十分不利。

國史館科員蘇聖雄報告〈國府遷渝背

景：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重探蔣中正是否藉淞滬會戰以使得日軍進攻軸線由北往南轉為由東向西。結論指出，蔣的淞滬戰略，有一演進過程，移轉戰爭軸線之戰略，戰前雖有討論，開戰後卻未實施。許多關於蔣中正中日戰爭的戰略論述，常以實際上打八年的格局進行分析，若深入蔣中正的脈絡，可以發現其固然對持久戰早有規畫，但持久的時間，可以是一年，可以是三、五年，也可以是實際上的八年。蔣所估計持久的時間，隨戰局與國際局勢變動。明瞭這一點，或許可以跳脫戰爭軸線移轉這種大的論述，實際且深入的去看蔣中正的戰略構想與布局規畫。

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副館長錢鋒，報告〈戰前中國對日國防地理戰略的形成與實踐〉，長時期的看中國國防地理戰略的形成過程，並指出重慶所以會成為抗戰大後方的中心，是因為富足、地勢險要、水路運輸便利及避免蘇聯的干擾。中國便是藉有效實施國防地理戰略，使中日戰爭戰略較量上取得顯著勝利。

四

下午第二場學術研討「抗戰中國的國家戰略（二）」，主持人為汪朝光，評議人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奇生。國史館審編處處長何智霖報告〈宜昌失陷後蔣中正對保衛四川的籌守（1940.6-1943.6）〉，以國

史館藏陳誠相關檔案為基礎，討論1940年6月中國宜昌失陷後，蔣中正為保衛四川之籌畫與因應。首先指出，宜昌失陷後，蔣決定重設第六戰區，調集精銳部隊，集結宜昌以西以為死守，並要求第五、第九戰區主力移駐增援。復以鄂西會戰為例，指出蔣中正戰事緊急之際，不斷通話前線指示，並嚴令堅守石牌要塞，終使日軍無法突破三峽防線。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院長張瑾報告〈《陳克文日記》中的重慶大轟炸圖像及其意義〉，藉由國民政府參事陳克文的日記，看其在重慶大轟炸中的行動及心態，最後分析日記呈現的意義：一、陳克文身為長時段親歷者的觀察，其日記為極為珍貴之一手文獻；二、陳克文觀察大轟炸地點和空間有所變化；三、日記呈現問題式的觀察與思考；四、日記提供若干可供探討的歷史細節。

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後方研究中心教授潘洵報告〈時空視野下侵華日軍重慶大轟炸歷史地位的認知〉，以豐富的圖表呈現日軍對中國尤其是重慶的轟炸概況，指出重慶大轟炸開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規模持續戰略轟炸的惡例，成為世界戰略轟炸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鍊條。

國史館簡任協修高純淑報告〈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收復東北與臺灣的籌畫〉，指出國民政府收復東北的籌畫包括：恢復東北四省政府建制，以表收復失地的決心；成立東北

調查委員會，以規劃戰後東北之建設。收復臺灣的籌畫，則有整合臺灣革命團體，及組織臺灣調查委員會。結語指出，戰後東北收復行動和籌備，顯得消極而被動，蔣中正對東北熟悉度遠超過臺灣，強烈主導收復東北之規劃。至於收復臺灣工作，則面臨人才與資訊不足。臺灣調查委員會聘用的臺籍人士離臺過久，對臺灣實際情況瞭解有限，且忽視臺灣人心理上的特殊感受。

陳紅民報告〈抗戰勝利前後：蔣介石、陳克文日記解讀〉，根據蔣中正與陳克文1945年7月至10月的日記，貫通戰前、戰後，探討國民黨最高領袖（蔣）與一般官員（陳）在勝利前後所思所想與所作所為，分析他們何時判定抗戰將獲最後勝利？得知勝利時之態度與作為為何？蔣勝利後的當務之急為何？結論指出，蔣中正抗戰勝利之初兩個月的應急處置，可稱「良好」，其政策與策略沒有太大失誤，甚至有邀請毛澤東赴重慶之「神來之筆」。然而，戰爭末期以後，國民黨軍政官員在國家面臨重大轉折關頭，卻多私心自用，期待升官發財，蔣的意旨乃無法貫徹，遂走上逐漸失去大陸的不歸路。

五

9月2日上午，舉行第三場學術研討「抗戰時期的內政與外交」，主持人為陳廷湘，評議人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江沛。

張瑞德報告〈侍從室與國民政府的情報工作〉，利用海峽兩岸收藏檔案及回憶史料，對侍從室在情報的取得、分析與運用、對各情報的管理、考核與聯繫，以及對軍政官員的監察工作等方面所扮演角色，作一全面探討。結論指出：一、侍從室人力精簡而業務繁忙，對蔣中正決策有所助益，彌補正式情報機構的不足。二、侍從室建立了對情報機關之考核與管理，惟盲點在不重各情報機關的反情報能力，以致洩密嚴重，無法改善。三、經由會報制度，加強各情報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擴大情報分享範圍，減少惡性競爭。四、調查貪汙不法，惟功能未能充分發揮，只能產生嚇阻作用。五、侍從室建立的情報監管體制及運作方式，一直延續至戰後臺灣，相關人員也在日後臺灣安全體系扮演重要角色。

南京師範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教授張連紅報告〈戰時國民政府對日軍罪行的調查〉，探討國民政府對敵人罪行的調查緣起，及1944年行政院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成立過程、運行與撤銷，指出由於各級政府對調查敵人罪行認識不足、戰時調查機構無法整合社會調查力量，復因戰時特定條件的制約，故戰時調查成效不彰，絕大多數日軍罪行，都是抗戰勝利後所進行的調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報告〈中國與義大利關係的演變（1936-1941）〉，指出抗戰爆發前，中義關係已出現變化，中國支持國際聯盟制裁義大利入侵

阿比西尼亞，造成中義關係的裂痕。隨著義大利與德國、日本接近，中國與義國愈益疏離。義大利承認汪兆銘政權之後，中義終走向斷交，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義間進入一個並無兵戎相見의 交戰狀態。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主任楊維真報告〈戰時中國政府對越南問題的態度（1937-1945）〉，整體考察抗戰期間的中越關係，指出因戰前中法關係良好，抗戰初期軍火多取道越南輸入，法國軍事顧問亦來華助戰。1939年歐戰爆發後，法國在日本壓力之下，暫停越南對華運輸。1940年法國戰敗，維琪法國成立，日軍進駐越北，造成中國西南大後方的嚴重威脅。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越南劃入中國戰區，中國對越態度轉趨積極。1945年法國在越殖民統治被日本推翻，中國開始籌劃攻越部署，準備配合盟軍反攻，解放越南。

六

第四場學術研討「抗戰時期的經濟與社會」，主持人為張瑾，評議人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首席編輯徐思彥。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李玉報告〈四十年代上海的「日光節約」運動：基於《申報》的考察〉，指出1940年代「日光節約運動」在上海得到廣泛和持續的推行，不過起止時間屢有變化，缺少規範。此運動的經濟效益雖不明顯，卻不失行政功用與文化意義。實際

推行過程，給民眾帶來明顯困擾，有些行業未蒙其利，深受其害。

江沛報告〈虛實之間：1942-1943年河南大災荒若干問題辨異〉，探討災荒真實狀況、國民政府救災行動、災民死亡人數及中外輿論的災情報導。提出當時國民黨行政官員之作為，並未如後來妖魔化之宣傳，其實有多方呼籲、積極賑濟的善良面。長期以來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意識，有意無意加重渲染了災荒程度。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柯惠鈴報告〈抗戰大後方的婚姻與家庭〉，以抗戰時期重慶的婚姻案件，分析戰爭中的社會變動，由法律角度切入，呈現戰亂時中國婚姻與家庭的不穩定狀態。當時一般夫妻雙方無法達成離婚協議時，並非進入司法程序，而是邀請第三方從中調解或仲裁。此外，國民政府有一套民事調解程序，家庭所在保甲的保長，還會成為糾紛調解的重要證人。至於民事調解費用，一般人都可以負擔，因而戰時重慶的離婚糾紛中，包括不少工人和農民等低收入階層。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學術副校長孫若怡報告〈貧困苦難與抗戰精神〉，探討究竟是怎麼樣的精神與力量，鼓舞當時的人度過抗戰艱苦歲月，並為中華民族孕育出大批優秀人才。研究指明，當時貧民百姓與知識分子均能以敬謹、樂觀、自律的生活態度，身體力行傳達威武不屈的生命信念，這樣的忍耐、勇毅、堅持，即為抗戰精神，成為戰勝

敵人的最佳見證，更為民族文化的新生奠定根基。中國歷經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如何繼承、轉化或創新抗戰精神，並能妥善處理新時代的問題，是民族文化真正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

七

9月2日下午，專家學者前往黃山重慶抗戰遺址博物館考察並座談。此博物館為抗戰時蔣中正官邸，亦為中國抗戰的指揮中心。考察完畢，舉行座談，楊天石、張力等學者對博物館的展覽及導覽詞，給予許多具體建議。

9月3日上午，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舉行「『抗戰歲月』展覽開幕式」，楊天石、陳永發發表致詞，隨後楊天石、陳永發、王奇生就抗戰史方面的問題，接受媒體專訪。下午舉行論壇的綜合討論與閉幕式，諸位學者交換意見，對重慶及大後方抗戰史的研究，提出許多具體建議。張憲文教授在2日上午的研討會，曾提到學界對抗戰基層社會的研究，還有很多不足，應該研究清楚抗戰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及非正常流動，此外，抗戰婚姻史的研究，亦應加強。王奇生教授此時則表示，抗戰軍事的研究，其實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中國學者對日本資料之利用，也很欠缺，有必要提倡推展。汪朝光最後總結，抗戰史應向課題多樣化發展，注意與現代化結合，並抱持國際化視角。此次會議，在對抗戰史全面且充分的反思之中，圓滿落幕。

新書介紹



沈昌煥日記： 戰後第一年（1946）

2013年9月出版
平裝 350元

1946年1月至12月期間沈昌煥擔任國民政府秘書，見證國共和談、馬歇爾使華、司徒雷登接任駐華大使等重大歷史事件。國史館特將此年日記重新排印出版，俾利專家學者從事此段歷史的研究。

請洽國史館訂購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電話：02-23161067
網址：<http://www.drnh.gov.tw>